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·薪火映黔山

甲秀楼的灯火，在南明河的柔波里，倒映出今天的宁静与繁华。黔灵山的风，早已吹散了历史的硝烟，只留下草木的清香。

时间冲刷着记忆，土地铭刻着历史。

这片土地始终记得。80多年前，当警报的悲鸣第一次撕裂贵州高原湛蓝的天空，山河为之变色；晴隆二十四道拐上，不分昼夜轰鸣的引擎，是维系国脉的喘息；1939年贵阳二四轰炸后，废墟上的撕心裂肺；在遥远的雁北，一群贵州人在冲锋中定格的年轻身影。

烽火，曾是这里的背景色；呐喊，曾是这里的主旋律。80年前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，离不开贵州人用生命书写的壮丽史诗。



抗战期间贵州各地童子军教练员在贵阳集中训练。资料图片

# 这片土地永远记得他们

## 从军报国热情席卷城乡

历史的惊雷，有时会提前炸响。

1932年的上海，一二八事变的炮火映红了黄浦江。

吴淞要塞，日军13艘军舰、24架飞机发动了开战以来最猛烈的轰炸。要塞司令临阵脱逃，危急时刻，参谋长、贵州三人都滕久寿挺身而出，沉着督战。

当炮弹片击中左臂，他血染征衣，指向前方，坚定喊道：“我辈军人，负有保国保民之责，速还炮杀敌！”话音未落，又一发炮弹呼啸而至，弹片撕裂了他的右臂，穿透了他的胸膛。

他望向远方，轰然倒地。

那一年，滕久寿刚满33岁，他的鲜血，是贵州儿女“为国赴难”的鲜红印记。

5年后，1937年，七七事变爆发，卢沟桥的炮火震醒了整个中华大地。消息传到贵州，贵州人民共赴国难。

文子全便是其中之一。1936年，工农红军第六军路过江口县城时，年仅13岁的他正光着脚在街上讨饭。一支抗战宣传队吸引了他，战士们高唱：“只有铁、只有血！只有铁血才能救中国……”铿锵的声音穿透晨雾，直击心灵。

他挤上前，拉住一位战士的手，急切地问：“小哥，我想跟你们去打鬼子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一句稚嫩的请求，是无数黔籍青年压在心底的呐喊。

从军报国的热潮席卷了贵州城乡。在贵阳火车站，在各县的招募点，离别的场景日复一日地上演。母亲把浆洗干净的粗布衣裳进行囊，父亲默默攥紧儿子的手。他们知道，这一去，或许便是永别，但国之不存，何以为家？

从1937年到1945年，在当时仅1000余万人口的贵州，共有639631人奔赴前线，远超原定征兵计划。这意味着，平均每百人中，就有近6.4人出征。原黔军改编的11个师，也相继投入淞沪会战、徐州会战、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，成为正面战场的坚实力量。

抗战洪流中，还有金沙女子蓝运瑜。1937年，她与家人一同考入贵州抗日战地服务团，学习战地救护。她选择用自己的双手，去守护那些在战场上最坚硬的骨头。

一个民族的觉醒，始于每一个普通人的义无反顾的选择。

**不仅是后方，也是与敌人殊死搏斗的前线**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沿海港口相继被封锁，地处西南腹地的贵州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维系全国抗战的战略通道。

国际援华物资经滇缅公路入境，必须通过贵州转运至重庆和各大战区。晴隆二十四道拐，这条盘旋在崇山峻岭间的公路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抗战生命线”。60度的陡坡，250米的高差，无数卡车在日夜行进。

据统计，经此转运的战略物资高达45万吨。每一吨物资的背后，都是驾驶员和无数民工肩挑背扛的血汗。

而贵州山川形胜同时构成了抗战的天然“防空洞”，巍峨的高山、磅礴的河流、险峻的峡谷等构筑起一道道日寇机械化部队难以逾越的天然防线，迟滞了日寇行动。正因如此，贵州更是成为了日寇的“眼中钉”。

自1938年起，日军的轰炸机如乌云般反复笼罩贵州上空。1939年2月4日，18架日机突袭贵阳，129枚炸弹倾泻在市中心。繁华的街道瞬间沦为人间地狱，597人遇难，1526人受伤，万余间房屋化为焦土，市区七分之一的面积成为废墟。史称二四轰炸。

从1938年到1944年，日军对贵州实施了38次空袭，投下630枚炸弹，造成2932人的伤亡、灾民20550人。



位于贵阳市三桥的86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。资料图片

# 大后方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刊



1938年私立清华中学师生举行保卫华南示威游行。资料图片

## 人物

黔籍抗战老兵、外交部原副部长韩念龙

## 铮铮铁骨扬国威
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净媛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但盘踞在华中地区高邮的日军自恃城高地险屯有重兵，拒不投降。

新四军发起高邮战役，也成为中国军队对日寇的最后一战。1945年12月25日晚，新四军趁浓雾，迎着风雨，踏着泥泞，向高邮城发起全面进攻。战至26日下午4时许，新四军攻破高邮城，在强大的炮火震颤之下以及围攻士兵的呐喊声中，高邮日军城防司令岩奇大佐不得不向新四军投降，当日随即举行投降仪式。

12月26日深夜，位于江苏省中部的高邮城内阴雨初歇，颐和巷70号的公园礼堂内灯火通明。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受降仪式在此举行——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规模最大的一次受降仪式，也是日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、新四军投降的最后一次受降仪式。

岩奇两脚叉开，双手叠按在柱头的军刀手柄上，脸色铁青厉声嘶吼：“我要同你方最高代表谈判！”

面对日寇的穷途猖狂，前往处理受降事宜的新四军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踏上上前：“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！”

“我代表新四军命令你立即下令无条件投降！”韩念龙目光锐利，严正之声响彻礼堂。岩奇表面收敛，却仍存侥幸心理，提出随身携带轻武器撤离，以备途中防身。

“想要得到安全，只有放下武器！无条件投降是你唯一可以选择的安全之途，除此之外的任何图谋皆无异于自取灭亡。”韩念龙依旧面不改色，正义严严地予以驳斥。

韩念龙的威严刺破“纸老虎”的面目，岩奇眼看大势已去，不得不解下身上的指挥刀放在桌上，随后双手捧着日军花名册和军械、军需登记册毕恭毕敬地呈送给韩念龙，并退回一旁站立。

随着武器和物资清点交接工作展开，各分数据点顺利日军也相继缴械投降，受降仪式圆满完成。

现场韩念龙的从容不迫，正义凛然，与敌方的色厉内荏形成鲜明对比。其表现出的机警和睿智，令在中方人员中观看仪式的粟裕司令员赞许。

韩念龙在这样较量中展现的不卑不亢、沉稳练达绝非一日之功。这位从贵州仁怀走出的革命者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在上海读书的韩念龙经常参加学生救亡宣传活动，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上海反日大罢工到苏中反“清乡”斗争，他参与领导发动6万多名工人群众，并组织游击战对15万日、伪军周旋作战，在革命烈火中锤炼出胆识与智慧。

韩念龙从街头呐喊到受降席前的从容，书写了一代人的抗战史诗。1945年那个雨夜在高邮展现的民族气节，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长卷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韩念龙转战外交战线，曾任外交部副部长、中国驻外外交学会会长。



抗战时期贵阳青年踊跃奔赴延安。资料图片

李祖伯(后排右一)当兵时与战友合影。受访者 供图

黔籍抗战老兵李祖伯

## 烽火岁月“飞毛腿”
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汪韵

8月26日上午10时，遵义市汇川区三阁公园旁，香水郡小区一间洒满阳光的客厅里，99岁的黔籍抗战老兵李祖伯颤巍巍地接过一份特殊的荣誉——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”纪念章。

满是皱纹的双手郑重地握着纪念章，李祖伯眼里泪光闪烁，恍如时光倒流，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。

“我是幸运的，等到了今天的好日子，看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。”他声音低沉却清晰。

1926年9月，李祖伯出生于贵州遵义县(今遵义市播州区)。1943年，未满17岁的他被征召入伍。当时抗战正处于相持阶段，兵源紧张，千余名新兵集中在遵义县城训练。

“那时候训练，饮食紧张，吃饭限时五分钟，哨声一响，放筷子就得停，常常不吃饱。”李祖伯回忆，“出操、跑步、持枪……纪律严格，白天训练，晚上不得随意出门。”

新兵训练结束后，李祖伯被分配到军需署交通器材处第十二油库，成为一名库兵，主要负责油库警卫和通信任务。

石油是战略物资，那时沿海被日军封锁，从印度港口空运到云南的军用物资，需要从滇缅、滇黔等公路运入内地战场。

李祖伯所在的油库1938年自南京迁至贵阳，属团级单位。油库常存汽油约千桶，每桶140千克，主要保障赴缅作战部队后勤供应，并为前往重庆的军政车辆提供油料。库长孔本戎是一位治军严格的中校。守护油库责任重大，30多名官兵日夜轮守，警

惕日军飞机轰炸和间谍破坏，从未出错。

李祖伯在油库担任通信兵，每日徒步穿梭于贵阳各个军事机关之间递送文件和情报。“军事机关分散布局，条件又艰苦，全靠两条腿跑路，战友都叫我‘飞毛腿’！”他笑着说。

1944年3月，一场意外险些让李祖伯付出生命。那天他乘坐三轮摩托车前往花溪送文件，返回途中在团坡桥发生车祸，连人带车坠河受伤。“在医院躺了大半年，伤好了，回去又继续干通信，直到抗战胜利。”

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，全军欢腾。“库长特意给我们放了一天假，官兵共庆胜利。大家高兴啊，又哭又笑，都知道——活下来了。”

抗战胜利后，李祖伯随部队前往山东、江苏、江西、广东等地。1949年，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参加两广战役和华东剿匪。1951年3月，他赴朝参加抗美援朝作战，经历五次战役、铁原阻击战和上甘岭战役，荣立二等功、三等功各一次。1955年转业后，李祖伯在遵义交通系统工作至退休。

从柜子里拿出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”纪念章，李祖伯整了整衬衫，又将新的纪念章端正佩戴在胸前，沉思良久：“国家一天比一天强大，心里高兴。”

一个月前，联勤保障部队博物馆筹建办来遵义寻访参战老兵、征集文物实物，老人将珍藏多年的一张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饭票捐赠出去。

如今李老已近期颐之年，与女儿同住，安享天伦。岁月流转，战火已远，那段血与火的记忆从未褪色，沉淀为一枚枚金色的纪念章。